

評介佐藤正広著《帝国日本と統計調査：統治初期台湾の専門家集団》

林文凱*



書名：帝国日本と統計調査：統治初期台湾の専門家集団
作者：佐藤正広
出版社：東京：岩波書店
出版時間：2012 年
頁數：336 頁

一、前言

近年來，日本學界有關殖民地的歷史研究，逐漸從過去強調殖民支配與民族主義反抗二元對立的殖民地史研究，轉向所謂的「帝國學知」研究取徑。這一研究取徑簡單來說有兩種特點，一、主張用所謂的「國民帝國」的模式來考察日本與殖民地間的互動關係。研究者主張十九世紀晚期以來的日本，一方面發展出各種社會體制來創造並統合其國民，以成為一個近代國民國家；但同時期日本經由殖民地的持續擴張，而開展為一個涵蓋多個異民族的殖民帝國，因此也須不斷重構其國族主義與殖民地統治的內涵，以便適當調整日本內地與各個殖民地間的關係。

二、在討論殖民統治的實際內涵時，不再是如過去一樣僅探討具體的政治、經濟、軍事或法律制度本身，而是同時關注與這些制度建構密切相關的各種學知之移植過程（教育制度與機構、知識承載者與學術知識的移植與交流），同時也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來稿日期：2012 年 8 月 6 日；通過刊登：2012 年 11 月 26 日。

著重於釐清這些殖民統治活動所涉及的知識與權力關係。這樣的討論，一來關切日本如何經由西方學知的學習建構出本國的諸種統治體制，另一方面也關注帝國如何透過學知的移植，將相關體制移植到殖民地，以便確立對於殖民地的統治。此外，許多討論也試圖擺脫學知由內地到殖民地的單向傳播與移植的既定觀點，進而討論在殖民地生成的許多學知如何經由殖民地的逆流，反向傳播到日本內地的過程。¹

日本統計調查史研究者佐藤正広先後出版的兩本專書，可以說是這一新的研究典範的示範。其在2002年出版的專書《國勢調查與日本近代》，討論戰前日本從事國勢調查（人口普查）的歷史。主要處理日本如何吸納西方學知以引入調查統計制度的歷史過程，並說明這一調查體制與國家政策形成（即作者所謂「國家意思形成」）以及國民意識的凝聚（「國民統合」）間的關連。² 佐藤正広最近更擴展該書第五章，有關日本帝國在殖民地臺灣從事的「臨時臺灣戶口調查」的相關討論，出版了有關日治時期臺灣統計調查史的研究專書《帝国日本と統計調査：統治初期台湾の専門家集団》。該書討論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引入近代調查統計的經過，描繪出相關學知的移植、殖民地統計專家集團的形成，以及1905年臺灣第一次人口普查的實施過程，同時釐清殖民政府如何經由這一體制再編地方行政，並統合殖民地人民的過程。

此書在帝國學知研究取徑的示範，或有關臺灣戶口調查歷史和殖民地行政與人民統合等重要研究議題上，都很有參考價值，因此筆者擬評介此書，以供臺灣學界參考。³

¹ 有關這一研究取徑的詳細內涵與代表性成果，參見岩波書店2006年出版的岩波講座叢書：「『帝国』日本の学知」（共八卷）。佐藤正広有一篇文章收錄於前述叢書的第六卷中，該冊專書討論日本帝國在本國與各殖民地或勢力範圍從事各類調查的歷史。參見佐藤正広，〈調査統計系譜：植民地統計調査〉，收於末廣昭編集，《地域研究としての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2006），「帝国」日本の学知：第六卷，頁179-204。

² 佐藤正広，《国勢調査と日本近代》（東京：岩波書店，2002）。

³ 近代日本在其本國與殖民地發展了各類型的社會調查，針對這些調查的理論與技術之發生發展，以及其為社會與國家所認知和接受的過程，參見相關套書的綜合介紹，川合隆男編，《近代日本社会調査史》（東京：慶應通信株式會社，1989-1994），第I、II、III冊。

二、內容介紹

本書共分九章。第一章討論本書的研究課題與方法，課題方面主要以日本統治初期的臺灣統計調查為研究主題，討論日本統治者如何建立出其行政構造，並利用這一構造完成對現地社會的調查，進而利用這些調查有效統合殖民地人民。在方法部分，本書研究對象包括以下幾類的行動群體：總督府的中央與地方官僚、臺灣在地的住民、及統計調查的專門家們，正文各章論述這些行動群體的主要活動內容，藉以說明日治時期臺灣統計學與統計調查的發展。

第二到第八章又可分成兩個部分，第二到第四章分別討論以上幾個群體在統計調查活動上的社會位置、認識架構、價值觀、及所面臨的問題；第六至第八章則討論這些群體在統計調查活動中的相互關係，及其所建構的調查制度之特性；而第五章則鋪陳以上兩個部分之間的關係。至於最後一章則簡要說明各章的主要研究發現。

以下簡介各章內容。第二章討論臺灣統計專門家的活動，考察統計學者與實務家如何使其學問與技術成為國家統治的技術，並討論當時的學問體系與今日比較的話，具有怎樣的特徵。主要分析統計專門家如何組織「臺灣統計協會」等專業社群，並在總督府與地方廳縣舉辦「統計講習會」，及發行《臺灣統計協會雜誌》等刊物，以利在臺灣移植並發展統計調查的學知與制度。書中指出臺灣統計協會的會員主要為總督府與地方官廳的官僚，顯示統計調查已成為許多官僚統治所需的學知。同時說明統計講習會的舉辦方式，和《臺灣統計協會雜誌》的內容，以便闡明統計調查學知的內涵。

第三章，以早期總督府的重要官僚持地六三郎與後藤新平為分析對象，討論其對臺灣統治的構想以及統計調查的看法，聚焦這兩名領導官僚對於臺灣領有與支配持有怎樣的認識，以及統計調查在這些認識中的位置及其意義。作者認為兩人有一些共通的特點，同時更強調，對兩人來說，在擬定殖民地的統治政策時，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與農家經濟調查、工業調查等諸種統計，是政策規劃、效果評估以及作出決定時不可或缺的資訊。

第四章，作者利用總督府公文類纂等相關史料，詳細討論日治初期的廳、支廳與街庄等地方行政制度與其運作的實態，釐清地方行政與在地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在廳制度的討論方面，作者介紹了1902年全島二十廳時期各廳的「管內概況」資料，說明當時總督府轄下各地方廳如何透過地方行政進行殖民統治與發展，並維繫社會統治的穩定。在支廳層級的部分，作者以1895-1897年間苗栗支廳的行政文書與圖書為例，指出支廳各部門的主要行政內容。最後，作者以1904年的基隆廳為例，說明街庄與保甲這兩個由現地住民自己組成的行政制度與其運作實態，並討論總督府如何監督街庄與保甲的運作。

在第五章，作者以新倉蔚與水科七三郎這兩位日治初期最重要的統計專家，針對地方行政機構統計調查業務所提出的評估報告書，分析當時統計專門家對於地方行政以及地方統計調查業務的評價。指出日治初期因地方行政機構變遷頻繁，日本人官吏、保正和街庄長統計素養不足，且民眾害怕調查統計資料用於徵稅等因素，以致調查結果不夠精確，顯示當時的地方行政雖有進展，但仍面臨統治上的阻礙與反抗。作者並認為二十廳時代以後，隨著地方制度的統一與統治的穩定，各種情報的均質性也的確持續提升。

第六章主要討論三個議題：一、統治初期總督府情報收集的目的與方式：指出總督府如何粗略地收集地方社會的法制、徵稅與地方制度等資訊，以便建立統治的基礎。二、情報收集的體系化與制度化過程：指出總督府如何規定各種緊急與固定情報的收集和報告之時程與方式。三、地方官廳如何實際執行情報收集工作：指出總督府的報告例僅有一些基本規定，但對調查方法與順序並沒有詳細規定，因此地方官府乃是根據地方社會的實際狀況決定具體調查方式，作者強調利用戰前調查統計資料時，應該注意到這個問題。

第七章討論臨時臺灣戶口調查的實施過程，⁴ 指出三個特點：首先，儘管總

⁴ 有關臺灣戶口調查的施行過程，另可參見阿部由理香從法制史角度針對戶口制度演變歷史的分析，以及富田哲針對戶口調查中有關臺灣人種族與語言調查等面向的探討。參見阿部由理香，〈日治時期臺灣戶口制度之研究〉（臺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1）；富田哲，〈台灣總督府の「種族」・言語認識：日本統治初期の人口センサス・戸口調査・通訳兼掌手当〉，收於崔吉城、原田環編，〈植民地の朝鮮と台湾：歴史・文化人類学的研究〉（東京：第一書房，2007），頁116-148。另外日治時期戶口制度的施行對於族群身分認同的影響，可參見詹素娟，〈臺灣平埔族的身分認定與變遷（1895-1960）：以戶口制度與國勢調查的「種族」分類為中心〉，《臺灣史研究》12:2（2005年12月），頁121-166。

督府試圖統一調查項目的定義，但實際上具體的調查方式仍是由各廳自行裁量，因此調查資料的統一性受到一定影響；另一方面，有關家族制度與職業的調查，臺灣社會人們的認識與日本人並不相同，因此有各種回答錯誤或誤記的可能性存在。其次，討論了當時參與戶口調查的組成：日本人（九成）與臺灣人（一成），其中又以警察、學校教師等為主，顯示當時的總督府統治仍相當倚賴警察武力的支撐；另一方面，從臺灣人的參與來看，也顯示已經有一定數目的地方協力者支持總督府的統治。最後，作者討論總督府指導者、地方官廳官僚與總督府統計專家們，對於戶口調查持有的不同態度和觀點，同時，論述了第一次大規模的人口普查是在殖民地臺灣而非日本內地舉行的理由。⁵

而在第八章，作者從比較史的觀點討論臺灣總督府的農家經濟調查。首先，指出統治初期，總督府為認識陌生的在地社會，先在臺北縣與臺南縣進行初步的農家經濟調查；而後，又繼續進行正式且系統性的農業基本調查或各類專門調查。其次，關於這些農業調查的技術，討論如何從「他計式」轉變為「自計式」，但因語言障礙與統計知識等因素，很多調查恐非真正的「自計式」調查。最後，作者從農家調查方式的比較指出，指出日本明治初期的村落與日治初期臺灣農村構造之差異，釐清這種差異對於統計調查的影響。

最後第九章，作者統合以上各章發現，將日本統治初期臺灣的調查統計發展分成三個時期（1895-1898，1899-1904，1905-1910），依序說明總督府與各級地方政府如何克服統治陌生社會所面臨的反抗，並發展出正式的調查行政體制與學知，以便掌握統治地方行政所需的資訊並推動各項政策的過程。作者同時也指出，在臺灣與日本內地相關調查統計實施方式的差異，釐清臺灣統計調查的一些特殊性，並建議讀者使用戰前調查統計資料時，應注意資料性質的問題。

⁵ 本書作者在另一篇短文中，針對這個問題作了進一步的討論，參見佐藤正広，“Why in Taiwan?: The First Census in the Japanese Empire,”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主辦，第一屆「臺灣研究世界大會」，2012年4月26日。

三、綜合評論

筆者以為本書有以下幾項值得重視的意義。首先，本書展現了「帝國學知」的研究範式，提醒學者注意日本在臺灣發展出來的諸多統治體制與內地體制間的關連，同時也注意到這些體制內涵的學知層面等議題。筆者以為這一新的研究典範的意義，不一定在於取代所謂的殖民壓迫／民族反抗這些既有的典範，毋寧是複雜化殖民統治的歷史複雜性，並引導我們注意許多過去未曾注意的現象。同時，值得注意的是，臺灣學界吳文星教授與其指導的年輕學者們十餘年前也開始展開學知類型方面的研究，陸續針對農學、林學、舊慣調查、宗教調查、土木技師、臺北帝大等議題進行討論。⁶ 臺灣學界的學知研究在問題意識，具體的研究方式和觀點上與本書作者有些不同，透過本書與這些研究的相互參照，相信有助於深化臺灣學界對於帝國學知研究範式的認識，且更深入認識帝國學知研究可以進行的方式，並將其應用於更多的研究議題。

另外，在討論學知的時候，常會關注知識與權力的關係，但處理這類關係時一般有兩種取徑：第一種方式，偏重於討論知識使用所展示的權力支配關係，一般預設知識本身並無權力性可言，僅關切所建立的知識是否能夠有效逼近所欲觀察或表述的社會與歷史事實，或者是否有助於權力支配的有效遂行。另一種討論方式，除了關切知識使用的權力性外，同時也關切知識建構與其性質本身的權力性，這種討論往往運用西方社會學者傅柯（M. Foucault）的知識社會學論點，以批判學知的文明、啟蒙或科學宣稱背後的潛在權力意涵。

本書作者的討論偏重第一種面向的探討，詳細說明日本殖民政府如何透過調查統計學知的引入，建立地方行政所需的正確情報，克服殖民統治初期來自被殖

⁶ 如吳文星，〈日本據臺前對臺灣之調查與研究〉，收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文學院與人文教育研究中心主編，《第一屆臺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文學院與人文教育研究中心，1995），下冊，頁567-576；吳文星，〈札幌農學校と台湾近代農学の展開：台湾總督府農事試験場を中心として〉，收於台灣史研究部會編，《日本統治下台湾の支配と展開》，（愛知：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2004），頁481-522；吳文星，〈札幌農學校畢業生與臺灣近代糖業研究：以臺灣總督府糖業試驗場技師技手為中心〉，《臺灣學研究》6（2008年12月），頁1-25。另在其指導下，年輕學者如鄭政誠、蔡龍保、葉碧苓、林佩欣等人也陸續有學知類型的研究發表。

民者的反抗，並有效推進總督府的社會經濟政策的開展。與此相對，臺灣學者陳偉智則利用傅柯等人的知識與權力理論，針對日治時期人類學與自然史進行分析，討論日治初期殖民政府如何利用人類學者的人類學與蕃情知識，治理臺灣的原住民族，並指出這些蕃情知識本身如何藉由其科學性與文明啟蒙宣稱，正當化殖民者對於臺灣原住民的支配。⁷

其次，過去學界在展開各種日治時期的歷史研究時，常利用殖民政府所生產出來的各種調查資料，以驗證其理論觀點或發展出各種理論觀點。但本書提醒我們注意這些調查資料的生產過程與方式，以免導致對資料意義的誤解。如作者指出，調查者與被調查者的語言使用、知識背景並不相同，所處的社會制度脈絡也有差異，同時被殖民者對於殖民者統治的反抗或知識生產用途的遺漏等因素，都可能導致調查統計所得，並非原先欲取得的「真實」資訊。⁸ 本書另外值得一讀的理由，在於儘管學界對於各類調查統計史料的利用已相當廣泛，但本書整理與應用的各類日治初期的調查統計資訊，提供了不少過去未曾注意到的情報。舉例來說第四章引用的「街庄狀態調查」的報告資料（頁 124），對於日治初期的地方行政與社會史研究，相信是很有用的。

其三，本書雖廣泛討論各種的調查統計活動，但主要以戶口調查、農家經濟調查等為主要討論議題，對於土地調查（1898-1904）、舊慣調查（1901-1919）這兩個重要的獨立調查活動，並沒有詳細討論。筆者以為後兩類調查對於殖民統治的重要性，應不亞於前述兩個調查，同時這些調查之間的關係也值得討論。歷史地理學者施添福在解讀土地調查的主要成果《臺灣堡圖》時，曾經指出 1904 年

⁷ 陳偉智，〈殖民主義、「蕃情」知識與人類學：日治初期臺灣原住民研究的展開（1895-190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陳偉智，〈田代安定與《臺東殖民地預察報文》：殖民主義、知識建構與東部臺灣的再現政治〉《東臺灣研究》3（1998 年 12 月），頁 103-146；陳偉智，〈自然史、人類學與臺灣近代「種族」知識的建構：一個全球概念的地方歷史分析〉，《臺灣史研究》16: 4（2009 年 12 月），頁 1-35。林佩欣為本書作者佐藤正広另一本書撰寫書評時，認為其與陳偉智等人利用傅柯理論的研究書寫模式是一樣的，但筆者以為兩人對於知識與權力關係的分析方式並不相同。參見林佩欣，〈評介佐藤正広《國勢調査と日本近代》〉，《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5（2006 年 6 月），頁 292。

⁸ 關於此點，筆者曾提醒學界注意，學界常引用的 1904 年之前臺灣總督府統計報告書中的耕地面積、土地生產量等相關資訊，其實是錯誤的。參見林文凱，〈再論清代臺灣開港以前的米穀輸出問題〉，收於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頁 99-133。

完成的堡圖及相關的地籍圖冊資料，使總督府可以透過「以圖統地、以地統人」的方式，有效且完整地統治殖民地的人民。⁹ 筆者以為本書作者討論的第一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之所以在 1905 年舉行，除了作者提到的許多因素外，戶口調查進行之前，《臺灣堡圖》、〈土地申告書〉、〈地籍圖冊〉對於臺灣村莊聚落邊界之確認，以及土地業主權者（大租戶、小租戶）的全面掌握，可能是總督府有把握在此時進行全面的戶口調查的原因之一。

最後，本書有一些小問題，在此簡單指出。首先，第四章討論日治初期臺灣的地方行政時，認為 1902 年二十廳時期臺灣的廳，其大小與面積大約與同時期日本的縣差不多（頁 92 註 2）。這恐怕是有問題的。根據初步統計，當時臺灣的廳平均面積僅約日本各縣的 28%，而人口則約 15%。¹⁰ 對日本統治者來說，其一開始規劃的三縣一廳的單位，從面積與大小來說，可能比較接近日本的縣級行政單位。

另一方面，作者討論支廳時，以 1895-1897 年的苗栗支廳為例，用意係將其當作前述廳以下的下級行政單位來加以分析。但採用這一時期的苗栗支廳並不是適當的範例，因為該時期的苗栗支廳係屬於「大支廳」時代。1895-1897 年間全島被劃分為一縣兩民政支部（1895 年 8 月～1896 年 4 月）或三縣一廳（1896 年 4 月～1897 年 6 月）等四個廳縣層級單位，而廳縣內部除各自直轄區域外，又劃分出 14 個支廳。因此該時期苗栗支廳的管轄範圍與人口數，與 1901 年二十廳（小支廳）時期的苗栗廳實際上差不多一樣大。¹¹ 此外，作者似乎也沒有區分清楚日治初期兩個不同的街庄指涉。作者引用「街庄狀態調查」中的 3,170 個「街庄數」，與相關段落中討論的「街庄長」，實際上是指向不同的空間單位（頁 123-127）。同份調查資料中的統計表，除了揭露街庄數外，也指出當時全島有 526 個街庄役

⁹ 施添福，〈「臺灣堡圖」日本治臺的基本圖〉，收於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原圖調製，《臺灣堡圖（上）》（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前頁部分。

¹⁰ 1902 年日本共有 47 個（都道府）縣級單位，若剔除北海道與沖繩縣的話，平均面積約 6,493 平方公里；人口部分，1903 年總人口約 4,852 萬人，平均每縣約 103 萬人。參見維基百科日文版，〈都道府県的面積一覽〉與〈過去の都道府県の人口一覽〉，下載日期：2012 年 6 月 10 日，網址：<http://ja.wikipedia.org/wiki/>。而 1902 年臺灣的行政建置為 20 廳，各廳平均面積約 1,800 平方公里（含當時並未實際統治的大量蕃地），而人口則每廳約 15 萬人。參見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文書課編，《臺灣總督府第六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1904），頁 107-109。

¹¹ 王世慶，〈日據時期臺灣各縣、廳、州、市報概說〉，收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特藏資料編纂委員會編，《臺灣文獻書目解題·第六種：公報類（一）》（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87），頁 133-193。

場。這些街庄役場管轄的空間單位應稱為「區」而非「街庄」，換言之，一個區約由 6 個街庄組成，而每一街庄長（1909 年改稱為區長）管轄約 5,500 人左右。¹²

此外，因本書設定的研究主題為日本統治者如何引入統計調查學知並創設相關制度，以完成殖民統治的過程，原始史料主要均為日文。雖說不一定會造成什麼大問題，但作者的確較少引用臺灣學界相關的中文研究成果。¹³ 況且，在某些議題的討論上，如果能夠運用相關的中文研究成果，或許可以讓本研究更臻完美。如第三章，作者利用持地六三郎《臺灣殖民政策》一書，分析持地對於臺灣原有經濟市場狀況的認識，與其任職期間臺灣市場圈的轉變，及對於未來臺灣經濟狀況的願景等之認識，藉以說明殖民地官僚如何利用調查統計認識殖民地的經濟現況、並規劃殖民政策。

作者文中已預先指出持地書中的認識，從今日來看是否正確並非其討論的主題（頁 73-77、頁 73 註 4）。但筆者以為，作者若能參考既有的清代與日治臺灣經濟史的研究成果，附帶指出殖民地官僚的認識和政策規劃上的限制，以免該部分的討論不慎予人殖民地官僚過於高瞻遠矚，或殖民政策毫無阻礙完美遂行的印象。¹⁴ 正如作者在書中其他部分一再指出的，殖民地官僚面對一個陌生的地方、和一群對殖民統治有疑慮或反抗的被殖民者，儘管利用新的學知發展出逐漸有效的殖民統治，但仍不斷面臨統治難題與政策上意外的後果等。不過，這或許也為臺灣學界有志於相關議題的研究者，留下進一步展開研究對話、交流的空間。

¹² 臺灣當時的街庄數與街庄役場數，參考書中引用的「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168 冊，第 1 件，第 8 張文書。以書中頁 130 討論的基隆廳為例，該廳區域數為 23 區，與上述文書中的役場數吻合。另外，若將臺灣街庄與日本町村加以比較的話，1903 年日本人口約 4,852 萬人，而當時町村約有 15,859 個，因此每個町村約有 3,060 人，比起臺灣的街庄平均約少 2 千餘人。1903 年日本町村數目的估計，參見日本政府總務省相關網頁，〈市町村数の変遷と明治・昭和の大合併の特徴〉，下載日期：2012 年 7 月 12 日，網址：<http://www.soumu.go.jp/gapei/gapei2.html>。

¹³ 但僅參考日文資料的確造成一些小錯誤，譬如頁 16 註腳 12 有關臺灣議會請願運動推動者林呈祿的活動說明，有些錯誤之處。

¹⁴ 持地六三郎對於晚清臺灣市場圈的描繪是有問題的，較正確的描述參見林玉茹，〈從屬與分立：十九世紀中葉臺灣港口城市的雙重貿易機制〉，《臺灣史研究》17: 2（2010 年 6 月），頁 1-37。而針對晚清臺灣米穀出口情況的分析也有問題，參見林文凱，〈再論晚清臺灣開港後的米穀輸出問題〉，《新史學》22: 2（2011 年 6 月），頁 215-252。另外，晚清臺灣南部主要出口品中的糖有將近一半的數額，係直接由打狗輸出到日本，因此不能說僅有微弱的市場關係，參見柯志明，〈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3），頁 52-56。這些經濟史的研究成果顯示，儘管殖民政府利用諸種學知所規劃的經濟政策，的確促進了日治時期臺灣經濟的發展，但這些發展相當程度也有賴於晚清臺灣原有的社會經濟結構，以及臺灣人自身的努力。

引用書目

日本政府總務省，〈市町村数の変遷と明治・昭和の大合併の特徴〉，下載日期：2012年7月12日，網址：
<http://www.soumu.go.jp/gapei/gapei2.html>。

維基百科日文版，〈都道府県の面積一覧〉與〈過去の都道府県の人口一覧〉，下載日期：2012年6月10日，網址：<http://ja.wikipedia.org/wiki/>。

川合隆男（編）

189-1994 《近代日本社会調査史》，第I、II、III冊。東京：慶應通信株式會社。

王世慶

1987 〈日據時期臺灣各縣、廳、州、市報概說〉，收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特藏資料編纂委員會編，《臺灣文獻書目解題・第六種：公報類（一）》，頁133-193。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佐藤正広

2002 《国勢調査と日本近代》。東京：岩波書店。

2006 〈調査統計系譜：植民地統計調査〉，收於末廣昭編集，《地域研究としてのアジア》，「帝国」日本の学知：第六卷，頁179-204。東京：岩波書店。

2012 “Why in Taiwan?: The First Census in the Japanese Empire.” 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主辦，第一屆「臺灣研究世界大會」，2012年4月26日。

吳文星

1995 〈日本據臺前對臺灣之調查與研究〉，收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文學院與人文教育研究中心主編，《第一屆臺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頁567-576。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文學院與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2004 〈札幌農學校と台湾近代農学の展開：台湾総督府農事試験場を中心として〉，收於台湾史研究部會編，《日本統治下台湾の支配と展開》，頁481-522。愛知：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2008 〈札幌農學校畢業生與臺灣近代糖業研究：以臺灣總督府糖業試験場技師技手を中心〉，《臺灣學研究》6: 1-25。

林文凱

2011 〈再論晚清臺灣開港後的米穀輸出問題〉，《新史學》22(2): 215-252。

2012 〈再論清代臺灣開港以前的米穀輸出問題〉，收於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頁99-133。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林玉茹

2010 〈從屬與分立：十九世紀中葉臺灣港口城市的雙重貿易機制〉，《臺灣史研究》17(2): 1-37。

林佩欣

2006 〈評介佐藤正広《国勢調査と日本近代》〉，《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5: 279-293。

阿部由理香

2001 〈日治時期臺灣戶口制度之研究〉。臺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柯志明

- 2003 《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施添福

- 1996 〈「臺灣堡圖」日本治臺的基本圖〉，收於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原圖調製，《臺灣堡圖（上）》，前頁部分。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富田哲

- 2007 〈台湾総督府の「種族」・言語認識：日本統治初期の人口センサス・戸口調査・通訳兼掌手当〉，收於崔吉城、原田環編，《植民地の朝鮮と台湾：歴史・文化人類学的研究》，頁 116-148。東京：第一書房。

詹素娟

- 2005 〈臺灣平埔族的身分認定與變遷（1895-1960）：以戶口制度與國勢調查的「種族」分類為中心〉，《臺灣史研究》12(2): 121-166。

陳偉智

- 1998 〈殖民主義、「蕃情」知識與人類學：日治初期臺灣原住民研究的展開（1895-190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1998 〈田代安定與《臺東殖民地預察報文》：殖民主義、知識建構與東部臺灣的再現政治〉，《東臺灣研究》3: 103-146。
- 2009 〈自然史、人類學與臺灣近代「種族」知識的建構：一個全球概念的地方歷史分析〉，《臺灣史研究》16(4): 1-35。

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文書課（編）

- 1904 《臺灣總督府第六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

